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

〔日〕金子修一 著

徐璐 张子如 译

海外中国研究书系·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

主编 李浩 〔日〕松原朗

西北大学出版社

西北大学文学学科资助项目

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

〔日〕金子修一 著
徐璐 张子如 译

西北大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陕版出图字 25 - 2018 - 2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 / (日)金子修一著;徐璐,张子如译.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10

(海外中国研究书系 / 李浩,松原朗主编. 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

ISBN 978-7-5604-4266-2

I. ①中… II. ①金… ②徐… ③张… III. ①皇帝—祭祀—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892.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8302 号

本书由日本岩波书店、金子修一授权出版

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

作 者：〔日〕金子修一 著 徐璐 张子如 译

出版发行：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710069

电 话：029-88302590 88303593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 / 16

印 张：28.75

字 数：441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04-4266-2

定 价：1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电话 029 - 88302966。

著者简介

金子修一，历任高知大学文理学部助手、高知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山梨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山梨大学人间科学部教授，现任国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著有《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隋唐的国际秩序与东亚》等著作。

译者简介

徐璐，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副教授，曾赴日本京都橘大学和爱知大学访学。出版译著有：《长安——绚烂的唐都》《唐代长安镇墓石研究》。

张子如，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同志社大学日本文学博士，陕西省翻译协会理事。

《海外中国研究书系·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

学术顾问

〔日〕池田温 袁行霈 张岂之 王水照 莫砺锋 陈尚君 荣新江

组织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日〕松原朗 吴振磊

委 员 李 浩 马 来 张 萍 杨遇青 刘 杰 赵 杭 张渭涛
谷鹏飞

日方联络人 张渭涛

编辑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段建军

委 员 〔日〕松原朗 〔日〕妹尾达彦 〔日〕埋田重夫 〔日〕冈田充博
〔日〕石见清裕 〔日〕丸桥充拓 〔日〕古川末喜 〔日〕金子修一
段建军 谷鹏飞 高兵兵 张渭涛 刘建强 何惠昂 马若楠

主 编 李 浩 〔日〕松原朗

副主编 高兵兵

总序一

记得四年前，老友松原朗教授将其新著《晚唐诗之摇篮——张籍·姚合·贾岛论》的书稿转我，嘱我推荐给西北大学出版社，希望唐诗故乡的中国学人能及时读到这部新著，并能给予全面的学术批评。我充分理解松原兄的诚挚愿望，彼时恰好我还在校内外的学术管理部门兼一点服务性的工作，也想给学校出版社多介绍一些好作品，于是“怂恿”松原兄把原来的计划稍微扩大，从翻译出版一位日本学者的一部作品，扩展到集中推出一批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开始时，松原兄及其他日方学者并没有迅速回应，这其中既有对西北大学出版社和西北大学唐代文史研究团队的估量，也有对翻译力量、经费筹措等问题的担心。我很能理解朋友们的忧虑，毕竟，自我们与专修大学等日方学术机构和友朋合作以来，这是最大的一个项目。

出乎意料，等项目确定后，松原先生及其他相关作者表现出很高的学术热情和工作效率，他们自己和原书的日本出版方联系，主动放弃版权贸易中的版税，简化相关谈判手续，使得许多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最后商定第一批推出的是以下八部著作：

《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妹尾达彦著，高兵兵、郭雪妮、黄海静译）

《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金子修一著，徐璐、张子如译）

《唐代军事财政与礼制》（丸桥充拓著，张桦译）

《唐代的外交与墓志》（石见清裕著，王博译）

《杜甫农业诗研究——八世纪中国农事与生活之歌》（古川末喜著，董璐译）

《白居易研究——闲适的诗想》（埋田重夫著，王旭东译）

《晚唐诗之摇篮——张籍·姚合·贾岛论》（松原朗著，张渭涛译）

《唐代小说〈板桥三娘子〉考》(冈田充博著,独孤婵觉、吴月华译)

用中国学人的分类标准来看,前四部是属于史学类的,后四部是属于文学类的,第二部严格意义上说又不完全属于断代类的研究。故我们最初将丛书的名称模糊地称作“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也暗含对文史兼容实际的承认。最后确定为现在的名称,是因为在申报陕西省出版资金资助项目时使用了这个名称,故顺势以此命名。

依照松原先生的理解,他所选择并推荐给中国学界的是最能体现并代表当代日本学界富有日本特色的中国学研究成果,松原先生在与我几次邮件沟通中反复强调这一点,体现了他和他的日本同行的执着与认真,这一层意思松原兄在序中表达得更准确。当然,符合他这一标准的绝不止这八部著作,应该还有一大批,我熟悉的日本学界的许多朋友的著作也没有列入。按照初始计划,我们会与松原兄持续合作,推荐并翻译更多的日本中国学研究成果。

我们学界现在也开始倡导中国话语、中国风格和中国流派,看到日本同行已经捧出一系列能代表自己风格学派的成果,我们除了向他们表达学术敬意外,是否也应该省思自己的学术哲学和研究取向。毕竟,用自己的成果说话才是硬道理。

当下学术走出去的热情很高,而对境外学人相关研究成果的移译与介绍则稍显冷落。按照顾彬(Wolfgang Kubin, 1945—)的解释,文学走出去相当于到别人家做客,主动权在他不在我;文学请进来,让友人宾至如归,则主动权在我不在他。我们能做的事,能做好的事,应尽量做充分、做扎实、做精深。方以学术史,法显求法译经,玄奘团队述译,严复不仅以译著《群己权界论》传世,更奠定“信、达、雅”的译事三原则。近代以来,中国重新走向开放,走向世界,实与大规模翻译、引进、介绍海外新思想、新理论、新学说密不可分。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谦逊的说法,其实是我们主动拥抱马克思主义,主动引进现代科学,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其他世界学术名著。这一文明交往的基本史实在当下不该被有意遗忘、无意误读。身处其间,以温故知新、继往开来为己任的当代学人,不知该说些什么?又该做些什么?

本丛书的翻译团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原书作者推荐的,另一

部分是由出版社和高兵兵教授约请的。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著者与译者分处境内外,天各一方,联系和对接未必都畅通,理解和翻译的错误在所难免,出版后恳请各方贤达不吝赐教,以便我们逐步完善。其中高兵兵教授此前曾组织翻译过两辑“日本长安学研究丛书”,有组织能力,也有较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张渭涛副教授既是译者,又身兼日方著者和中方出版者的信使,青鸟殷勤,旅途劳动,多次利用返乡的机会,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

按照葛兆光教授等学者的解释,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由朝贡体制型塑的认知模式,而忽略甚至漠视从周边看中华的视角,好在现在大家已经认识到通观与圆照方可认识事物,包括认识我们文化的重要性。这样,翻译并介绍周边受到汉文化深刻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汉学研究成果,就有了三重意义:一是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周边地区的汉文化观,二是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勾画原典文化散布播迁的轨迹,三是丰富了相关专题研究的学术史。

当前,“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正如火如荼,其中最富启示性的思想,我以为是“文明互鉴”理论,即各种文化宜互学互鉴。学术成果的翻译介绍,就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设桥梁,充当使者。自古以来,我们的民族认为,架桥铺路于承担者是一种救赎的苦行,但于接受者则是一件无量的功德。对于中外文化的互译也应作如是观。

李 浩

2018年5月30日

于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寓所

总序二

日本的中国学,也就是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即便是将中国学之意仅限定为“中国古典文献的接受、解释、说明之学”,也已经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了。而且,日本处于中国历代王朝册封体制的外缘,始终与中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而能远离权威,相对自由。这使得日本的中国学,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近年,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性格。

在属于以往册封体制内的诸地域,是以忠实于中国文化、对其进行完全复制为价值标准的。而日本却不同,它对中国文化反而采取了选择性接受的方式,并积极对其加以改变。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日本的文字创制。平安时代(794—1192)初期,日本以汉字为基础创制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它们都是纯粹表音的文字,日本人从此确立了不借助汉语和汉字就能直接用日语表达的方法。相较于世界各地昙花一现的种种化石文字,日本独有的这种假名文字,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源氏物语》(约1008年成书)之所以能成为反映日本人审美价值观的决定性文学作品,就是因为它是使用平假名书写的。那么,如果从中国本位的角度看,无论是假名的创制,还是《源氏物语》的问世,都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脱离。也就是说,日本以脱离中国文化为反作用力,确立了自身文化的独特性。

日本虽然从广义上说是中国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的一员,却有独立的文化主张,而且日本人对此持肯定立场。这样的倾向并非始于明治维新后的近代,而是有着相当长的历史。近代以前的江户时代(1603—1867),虽然因江户幕府的政策,汉学(特别是朱子学)一度占据了学术主导地位,但在江户时代后期,由于国学(日本主义)和兰学(以荷兰语为媒介的西学)这两个强劲对手的崛起,汉学便失去了独尊之位。

但是,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日本人轻视中国文化。反而应该说,至少在20世纪初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日本人都一直在非常真挚地学习中国古

典,不仅解读文字,也解读其中的精神。日本知识界真正远离中国古典,是在二战结束以后。

福泽谕吉(1835—1901,庆应义塾大学创始人)被认为是一位致力于西学、倡导“脱亚”、堪称日本现代化精神支柱的思想家,然而他在十几岁不到二十岁的这段时期,却是一直在白石照山的私塾里攻读汉文典籍的。他在《福翁自传》里写道:

岂止《论语》《孟子》,我研习了所有经书的经义。特别是(白石)先生喜欢的《诗经》和《书经》,常得先生讲授。此外诸如《蒙求》《世说》《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等,也经常听讲,后又自学《史记》、两《汉书》《晋书》《五代史》《元明史略》等史书。我最为得意的是《左传》,大多数书生仅读完十五卷中的三四卷便会放弃,而我则通读全书,且共计复读了十一遍,有趣之处都能背诵出来。

应该说,福泽谕吉并非摒弃中国文化而选择了西方文化,他是从中国古典中学到的见识与洞察力作为药捻,而后才得以大成其思想的。在当时包括福泽谕吉在内的日本知识界人士看来,中国古典并非一大堆死知识,而是他们从中汲取人生所需智慧的活的“古典”。就这样,日本文化一边尝试无限接近中国文化,一边又试图从中国文化中脱离,形成了具有双向动力的内部结构。

由中国文化或中国统治权威中脱离的倾向,甚至在处于日本中国学核心位置的儒学中也有发生。江户时代,幕府将朱子学尊为官学,这也反映了朱子学在明清两代的权威性。不过,江户时代的两位代表性儒学家伊藤仁斋(1627—1705)和荻生徂徕(1666—1728)却例外,他们两人,前者提倡“古义”,后者提倡“古文辞”,都还原了儒学的本来面目,超越朱子学成为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伊藤仁斋的《语孟字义》比戴震(1724—1777)《孟子字义疏证》的主张早了一个世纪。而荻生徂徕将道德思想从儒学中排除,认为圣人只是礼乐刑政等客观制度的设计者。荻生徂徕本来是出于对儒学的忠实,去探索儒学的真面目的,但结果几乎与儒学传统背道而驰。也就是说,荻生徂徕的儒学已经达到了非儒学的境地。荻生徂徕的这些主张,超越了儒学的界线,给当时整个思想领域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致使江户

后期的思想界,摆脱了朱子学的桎梏,并诱发了国学和兰学的兴起,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应该说,无须等待西方的冲击,近代日本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内部准备。

上文说过,日本文化的内部,具有一边尝试无限接近中国文化,一边又试图从中国文化中脱离的双向动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认识到,看似舍弃中国文化而选择了西学的福泽谕吉,以及原本乃是中国文化忠实者后来却成了一位破天荒思想家的荻生徂徕,两位都是此种日本文化特征的体现者。

从宏观上看,日本属于中国文化圈,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因为从根本上说,日本受其地理条件所限,也不可能有机会与强大到足以与中国文化抗衡的其他先进文化发生接触。即便是印度的佛教,也是通过经中国文化过滤的汉译佛典,即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被接受的。但在这种状况下,日本没有被强大的中国文化同化,而得以贯彻其独自的文化体系,这几乎就是个奇迹。日本所处的特殊位置,与太阳引力作用下的地球不无相似之处。如果离太阳再近一些,就会像金星一样被灼热的太阳同化;而若是离太阳再远一些,就又会像火星那样成为一个冰冻的不毛之地。地球就是在趋向太阳的向心力与反方向的离心力的绝妙平衡之下,得以悬浮在太阳系中的一颗明珠。

如果以中国的视角重新审视的话,这样的日本文化反倒是显示中国文化普遍性及包容性的绝好例证,中国文化绝不是仅有忠实者顶礼膜拜、悉心呵护的单一僵死之物。日本的文化,从其具有脱离中国权威的反作用力这点来说,就算不是叛逆者,也无疑是个不忠者。但能够产出这样的不忠者,也是因为中国文化具备卓越的包容力与普遍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为了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将包括日本文化在内的多样性思考纳入视域,也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日本的中国学,绝非中国文化的忠实复制,也并不是像一个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初见新大陆般的、出于一片好奇心的结果。我们便是基于上述认识,想尽可能地提供一些新的见解和观点,所以策划了这套《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书目选择的主要原则,并不是仅以学术水平为准绳的,而是优先考虑了具备日本独特视角的研究成果。广大读者如果对我们

的主题设置、探讨方式等有一些微妙的不适应,我想说,那正是我们这套书的策划宗旨,希望大家理解这一点。此外,我还热切期待这套小小的丛书能为日中文化交流发挥出大大的作用。当然,也真诚期望得到各位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松原朗

2018年4月8日

前言

本书是继《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汲古书院,2001年)之后,笔者的第二部有关皇帝祭祀论著。由专业性考证论文汇编而成。各章内容具体如下:

序章 “皇帝统治与皇帝祭祀——以唐代的大祀、中祀、小祀为主”,出自《关于唐代的大祀、中祀、小祀》(《高知大学学术研究报告》第二五卷人文科学第二号,1976年)。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的郊祀、宗庙祭祀制度”。

第二章 “唐代的郊祀、宗庙祭祀制度”。

第一、二章均出自《关于魏晋至隋唐的郊祀、宗庙祭祀制度》(《史学杂志》第八八编第一〇号,1979年)。

第三章 “唐代皇帝祭祀的亲祀与有司摄事”,出自同名论文(《东洋史研究》第四七卷第二号,1988年)。

第四章 “汉代郊祀、宗庙制度的形成及其运用”,根据《中国——郊祀、宗庙、明堂以及封禅》(井上光贞等编《东亚世界中的日本古代史讲座》第九卷所收,学生社,1982年。收录在上述拙著《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以及《东汉——关于南朝的皇帝郊庙亲祀》(唐史论丛编纂委员会所编的《春史卞麟锡教授花甲之年纪念唐史论丛》,韩国大邱市城津图书出版发行,1995年);《东汉——南朝的郊庙亲祀再论》(春史卞麟锡教授荣退纪念论丛发行委员会所编的《春史卞麟锡教授荣退纪念论丛》,韩国釜山市昆吾院图书出版发行,2000年)这三篇论文中相关部分修改而成。

第五章 “魏晋南朝的郊祀、宗庙运用”,源自前文中《东汉——关于南朝的皇帝郊庙亲祀》以及《东汉——南朝的郊庙亲祀再论》。

第六章 “北朝的郊祀、宗庙运用”,出自《关于北魏时期的郊祀、宗庙》(《山梨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四七号[1996年度],1997年)《关于北

齐、北周、隋时期的郊庙亲祀》(同上刊第四八号[1997年度],1998年)。

第七章“唐代郊祀、宗庙运用”,出自《关于唐太宗—睿宗的郊庙亲祭——唐代皇帝的郊庙亲祭(1)》(唐代史研究汇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所收,汲古书院,1992年)、《关于玄宗朝的皇帝亲祭》(池田温编《中国礼法与日本律令制》所收,东方书店,同年)、《关于唐后半期郊庙亲祭——唐代皇帝的郊庙亲祭(3)》(《东洋史研究》第五五卷第二号,1996年)。

第八章“中国古代的即位仪礼与郊祀、宗庙”。关于隋之前的,是根据下列两篇文章新撰写的文稿,即,《古代中国的王权》(网野善彦等编《岩波讲座、对天皇与王权的思考》第一卷所收,岩波书店,2002年)、《关于中国古代的即位仪礼场所》(《山梨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研究报告》第四九号〈1998年度〉,1999年。收录在上述拙著《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唐代部分,出自《关于唐玄宗的谒庙礼》(《山梨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四二号〈1991年度〉,1992年)、《关于唐太极殿与大明宫——在即位仪礼中的作用》(同上刊第四四号〈1993年度〉,1994年)、《关于唐太宗、肃宗的即位——禅让即位的程序讨论》(同上刊第四六号[1995年度],1996年)。

第八章附论“关于唐朝帝室的谒庙——皇帝、皇太子、皇后”,出自同名论文(《中国古代国家与民众》编辑委员会编《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国家与民众》所收,汲古书院,1995年)。

终章“从郊祀、宗庙及即位仪礼看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特质(新稿)”。

如上,对于已发表文稿,均增补了之后所发现的新史料,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改订正。笔者坚持尽可能多列举所发现的史料。所以,对于在《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中已介绍过的史料,根据需要重新引用,相关文章反复修改,以免与该书重复。另外,应该算作笔者真正意义上关于皇帝祭祀的论文,即《对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的考察》(《史学杂志》第八七编第二号,1978年)一文,因与笔者目前对该问题的见解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只将目前认为有参考价值的部分收录到了相关章节。关于这一点,在书中进行了说明。

关于中国祭祀、仪礼的史料,一般读者可能不十分了解。所以,在引文之后均添加了日语古文读法(译者注:中文版删节),并尽量使用简单易懂

的日语。另外,原文中的标点符号与日语古文读法句的标点符号,在很多地方不相同。语义难理解之处,一般在日语古文读法句下面加上“〈〉”括号进行说明。但,如果全部附加说明,又会占去很多篇幅,所以,仅据行文需要进行说明。引用较长原文时缩进两个字;较短原文,在文中用括号引用,均使用古字体(译者注:中文版均采用规范简体汉字)。另外,如《周礼·地官·鼓人》:“以雷鼓鼓神祀”,贾公彦疏:“天神称祀,地祇称祭,宗庙称享。”文中祭祀天地使用祀、祭,祭祀宗庙使用享。故本书中郊祀,使用祀的说法。而实际上,原文中对于祭、祀并没有严格地进行区分。

本书并未按其他研究类书籍那样设置专门章节以整理研究史。现在,中国国内研究国家祭祀、仪礼的研究成果也渐渐多了起来。但是,在笔者刚开始从事该项研究时,还处于毫无先行研究可参考的状态。比起近些年出现的一些研究成果,笔者的基本见解、观点相对较早。研究皇帝祭祀的初衷,在于从祭祀仪礼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皇帝治国的特点。中国在20世纪初,帝制已经消亡,而日本现在仍然保留着天皇制,同样是皇帝祭祀,研究方法应该有很大差异。此内容可参见《中国古代皇帝制度诸问题》(初次发表1997年)的第一章。

另外,关于正史的引文,基本引用台湾艺文印书馆发行的二十五史(《汉书》为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后汉书》同样为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三国志》是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晋书》是吴士鉴、刘承干同注的《晋书斟注》)。仅本文存疑之处通过中华书局的标点本正史进行校正。《史记》参考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册府元龟》使用了台湾中华书局再版的明刊影印版。《白虎通》不同版本卷数不同,本书据清代陈立撰的《白虎通疏证》(底本为光绪元年淮南书局刊本的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此外,避讳字的处理方法是在右侧用“()”显示正字,并在日文古文式读法中使用了正字。

目录

总序一	李 浩(1)
总序二	松原朗(4)

前言	(1)
----------	-----

序章 皇帝统治与皇帝祭祀

——以唐代的大祀、中祀、小祀为主

一、序言	(1)
二、唐代的大祀、中祀、小祀诸相	(1)
1. 开元礼中的大祀、中祀、小祀	(1)
2. 大祀、中祀、小祀与皇帝的自称	(3)
三、关于祝版	(6)
1. 祝版的御署	(6)
2. 祝版与有司掇事	(7)
3. 大祀、中祀、小祀的变动	(10)
四、小结——本书的展开	(13)

上编 郊祀、宗庙祭祀制度的成立及其发展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的郊祀、宗庙祭祀制度

一、宗庙祭祀制度的发展	(21)
1. 魏晋及南朝的宗庙祭祀	(21)
2. 北朝及隋的宗庙祭祀	(24)
二、魏晋及南朝的郊祀制度	(27)

1. 关于郊祀的郑玄说与王肃说	(27)
2. 魏晋的郊祀制度	(28)
3. 南朝的郊祀制度	(30)
三、北朝及隋的郊祀制度	(34)
四、小结	(38)
附论 前方后圆坟的起源与西晋的郊祀改革	(38)

第二章 唐代的郊祀、宗庙祭祀制度

一、唐代的宗庙祭祀	(45)
二、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	(46)
三、唐代郊祀制度的展开	(49)
四、明堂与雩祀	(54)
1. 唐代以前的明堂	(54)
2. 唐代以前的雩祀	(56)
五、小结	(58)

第三章 唐代皇帝祭祀的亲祀与有司摄事

一、导言	(65)
二、关于有司摄事的频度	(66)
三、皇帝亲祭与有司摄事的区别	(71)
四、摄官与有司摄事形式化的诸问题	(79)
五、小结	(86)

下编 郊祀、宗庙祭祀制度的实行及其意义

第四章 汉代郊祀、宗庙祭祀制度的形成及实行

一、导言	(97)
二、西汉的郊祀、宗庙祭祀	(98)
1. 西汉郊祀制度的特点	(98)
2. 西汉宗庙祭祀制度的特点	(106)